



与历史对话 与文化相遇

——写在《字见大同》(2026版)推出之际

杨刚

做了多年文创日历《字见大同》，时光与文字纠缠在一众人的心中。从策划到编辑，从撰文到摄影，从设计到印制，大概已成为大家的一个心结了。日升日落，继续在历史文化的长河里撷取文字，终于推出了《字见大同》的2026年版本，力图让文字、图片、历史相呼应，让每一页都是一次与历史的对话、与文化的相遇。

观察人类的文字史，汉字是颗独树一帜的恒星。与拼音文字不同，汉字以“形、音、义”三位一体的独特构造，成为承载文明、传承智慧的活化石，更成为中华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重要标识。从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到商周青铜器上的金文，从秦代规范统一的小篆到汉代普及的隶书，从北魏的平城魏碑到行云流水的行书草书，汉字的演变史本身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华文明发展史。

及至当下，作为中华文明最鲜明的精神标识，汉字更是成为笔画纵横间串联起历史与当下、个体与民族、城市与天下的文化纽带，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基因，也镌刻着大同这座大古都的流转变迁。

许慎在《说文解字》中说：“仓颉之初作书，盖依类象形，故谓之文；其后形声相益，即谓之字。”“日”摹写太阳之形，“月”勾勒月牙之态，“山”再现峰峦叠嶂，“水”模拟奔涌之势……古老的象形字是先民对自然万物的直观感知与线条表达，将天地山川、草木虫鱼定格为永恒的符号。当这些基本符号相互组合，便产生了更丰富的指事字、会意字、形声字。超越具象，让汉字兼具了形象性与逻辑性。

于是，汉字不仅是交流的工具，更是承载哲学思想、文化精神的载体——纵然地域辽阔方言林立，我们依然能够

顺畅沟通、文化认同；即便时隔千年书写变化，我们依然能读懂《诗经》《楚辞》《木兰辞》，能理解司马迁、李白、苏轼……汉字如同一条无形的血脉，将中华民族过往当下东西南北紧密相连，让文明的火种代代相传。正如学者余秋雨所言：“汉字是中华文明长寿的秘密，它是活着的图腾，永恒的星辰。”

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，汉字不断吸收融合外来文化元素，丰富自身的内涵与外延。佛教传入中国后，“佛”“禅”“僧”“尼”等汉字应运而生，成为佛教文化在中国传播的重要载体；南北朝时期，拓跋鲜卑统一中国北方，定都平城，汉字不仅没有被取代，反而吸收了少数民族文化的养分，催生了书法艺术的繁荣，开创了平城魏碑体，继而发展出郑体、洛阳体等；近代以来，面对西方文化的传播，汉字又通过创造新字、吸收外来词汇等方式，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，“电话”“电脑”“互联网”等新词的出现，让汉字始终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。

当这样一种伟大的文字与一座同样古老的城市相遇，便碰撞出了《字见大同》这件独特的文创产品——它努力让汉字从典籍走向日常，让城市的历史文化通过汉字得以具象化、生活化，也让我们在品读汉字的过程中进一步认识一座城市的文化基因。

从秦汉北疆要塞到北魏皇都平城，从辽金西京到明清边防重镇，过往的数千年里，大同始终是中原文明与草原文明交汇融合的前沿，也是多民族文化共生共荣的舞台。厚重的历史与灿烂的文化，被镌刻在了一个个与大同息息相关的汉字之中，成为城市独特的文化年轮。

“大同”，是中华文明的理想追求。甲骨文中的“同”字，像多人共居一屋之形，寓意着团结、包容、和谐。《说文解

字》释“同”字为“合会也”。“大同”二字，最早见于《礼记·礼运》：“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，选贤与能，讲信修睦。故人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，使老有所终，壮有所用，幼有所长，鳏、寡、孤、独、废疾者皆有所养，男有分，女有归。货恶其弃于地也，不必藏于己；力恶其不出于身也，不必为己。是故谋闭而不兴，盗窃乱贼而不作，故外户而不闭，是谓大同。”这一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社会构想，不仅为这座城市赋予了深刻的文化内涵，更成为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价值追求。

在大同的历史进程中，北魏政权定都平城(今大同)近百年，推行一系列汉化改革，促进了鲜卑族与汉族的深度融合。云冈石窟即是这种文化融合的艺术结晶，印度犍陀罗艺术、北方民族审美、中原文化，建构起多民族文化交融的典范。及至辽金，华严寺、善化寺、观音堂等继续成为多元文化交织的标志性建筑。因此，“佛”字在大同的文化语境中早已超越了宗教符号的意义，而成为文化融合的见证。在浑源的悬空寺，更是创造了佛教文化与儒家文化、道家文化兼容并蓄的新景观，形成了大同独特的文化品格。

“城”，是大同的历史骨架，也是文明的守护屏障。《说文解字》释“城”字，“以盛民也。从土，从成，成亦声。”“城”字的构造形象地揭示了其“以土筑墙，保卫民众”的本义。大同作为边塞重镇，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。从战国时期的赵长城到明代的大同镇长城，从北魏平城的宫城到明清大同府的城墙，“城”字贯穿了大同的漫长历史。新世纪修复后的大同古城墙不仅重现了“巍然重镇”的雄姿，更在给公众带来历史文化福利之际让“城”字找到了鲜活的

落脚点，还在不经意中构筑着人们的文化自信。

一个个汉字，如同一块块拼图，拼接着大同的风貌；一个个汉字，又如一个个年轮，刻画着大同的变迁。今天，文明的交流与互鉴成为时代的主题，汉字也成为促进文明对话的重要桥梁。我们的内心深处有一种渴盼，希望以汉字为媒介助力大同的历史文化走得更高、更远，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能够通过汉字读懂大同、读懂中华文明。

迎来2026年，科技进步继续加速。语音输入、键盘输入等逐渐取代手写，“提笔忘字”已然成为一种普遍现象。编撰《字见大同》之际，大家也生出几许汉字传承的思虑，不过我们还是相信，汉字的生命力不在于书写方式的改变，而在于其深厚的文化内涵与精神价值。当然，我们希望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够主动拿起笔书写汉字，感受汉字的魅力；少年儿童从小多接触汉字文化，了解汉字的起源与演变，感受汉字背后的城市、国家、民族等广博内涵。

“山川异域，风月同天。”古老而神奇的方块汉字，让我们跨越时空，心意相连。辞旧迎新，在2026年的时光里，让我们继续带着对汉字的热爱、对文明的敬畏，与历史对话、与文化相遇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因触摸到文明的温度而更有意义。



扫描二维码查看置顶视频了解《字见大同》

悼青山老师

孙裕

青山老师走了！这个消息，让我本来沉重的心情又多了几分悲伤。我在同学群里写下了“音容宛在，风范长存”几个字，表达我的哀思。

我和青山老师相识于1979年春。那时，我是大同师专中文专业学生，他给我们讲写作课。开课不久，他留了一份作业：每人自命题写一篇文章。我写了悼念我的小学老师田枝荣的散文，他阅后，在课堂讲评时给予好评，并让我登台把这篇文章念了一遍。自此，他就能把我列入了“可塑之才”的范围。学校创办校刊《百草园》，我被选为编委之一，实际负责校刊编辑工作，他不时的住宿由学生宿舍搬入了校刊编辑部，使我在教室之外，又有了一个很静谧的学习地方，为深夜阅读创造了条件。青山老师当时是学校教务负责人，他给我们讲完写作课后，没有再开其他课程，但因有校刊这个纽带，他和我的联系并没有因课程结束而中断。他不时的到编辑部来，如果有时间就会坐下来和我长谈。那时所谈者，没有家长里短，大多是讲文化典籍、为学之道。在编辑部那个小屋里，我们谈过诸葛亮的《出师表》、李密的《陈情表》、韩愈的《祭十二郎文》、柳宗元的《永州八记》、归有光的《项脊轩志》，也谈过元稹的《遣悲怀》、苏轼的《江城子》、陆游的《钗头凤》。那些至情至性，经先生三句五句点评后，顿时有了灵性，像汨汨清泉，在我的心头流动。先生和我说，写文章，一是“识”，二是“情”，其次才是文辞句章。

青山老师在我们毕业那个学期调到了大同三中，先任副校长，不久任校长；我毕业后分到了市教育局。我们虽同在一个单位，见面并不是很多，但每次相见，都感到十分亲切，都要聊几句。我调到市政府后不久，他调到了云大，接触就更少了，但我们彼此都关注着对方。我在《大同日报》发表的文章，他说他篇篇都看。每年春节，我们都要见面。每次去他家，看到他家里满满的书籍，总会感慨不已，也更加明白老师何以博学了。

随着时代发展、工作变换，我们的生活条件也发生了变化。自上世纪90年代末期，我不时创造条件，和老师们相聚，延续和刷新我们师生间的友谊。每次相聚大家都说说笑笑，其乐融融，尽兴而归。青山老师每次到得很早，他和我谈：“我知道你会早来，我早来是想和你说话。”我们聊生活中的琐碎话题，也聊为学之道。记得有次我去找他，时间尚早，我们就在他住的那个小区大院里走了一阵。他问我：“最近看什么书？”我答：“看宋词。”他问：“你是看通本，还是看大家的集子？”我说：“是看几位大词人的个人集子。”他又问：“看过哪几个人的了？”我告诉他，我看过专集的词家有晏殊、苏轼、王安石、欧阳修、李清

照、辛弃疾、柳永、姜夔。他说：“你应该再看看北宋周邦彦和南宋吴文英的。周邦彦的慢词写得很好，王国维尊他为‘词中老杜’。这评价是很高的。吴文英的词写得很细密，一定是下了许多推敲功夫的。他是南宋词坛上与姜夔、辛弃疾鼎足而三的词人。你若想细细研读宋词，吴文英和周邦彦的集子不可不看。”我说：“我对慢词老是提不起兴趣，感觉理清文思脉络很费劲。”他说：“你可能是事多，静不下心来。”这番对话之后，我确实是找空闲时间，静下心来，很用心地读了些慢词，只可惜年纪大了，读完了记不了几句，但我相信，那些词中所蕴藏的文化精髓，有些已融化于我的血脉之中了。青山老师永远是我学习上的导师，我受惠于先生的东西是方方面面的，很多很多。

青山老师从内心里希望他的学生永远坚持学习。其实，他本人就是手不释卷、毕生治学不辍的典范。十多年前，我去看他时，问过他最近研究什么。他说，想看看宋诗、清诗，选两个集子。后来，果然先后有《宋人七绝选读》《清人七绝选读》两本书相继出版。这两本书，我都一字不落地拜读了。对《宋人七绝选读》、《云中古典诗话》《宋诗选注》结合起来读过。读完这本书，我还以《夜读有寄》为题写过一首小诗。除此之外，先生还有多部书籍出版，如《诗词赏析集》、《云中古典诗话》《上下册，系和李锋合著》、《咏史诗话》、《杨花集》等。

青山老师不但选注了前人的诗，出版了赏析前人诗作的书，他自己也写了不少诗。前些年，我们相聚时，他总会给我些他写的诗稿。这些诗稿，有的是打印的，有的是他手写的，上面还有修改的痕迹，前前后后，累积起来有400多首。这些诗，我曾在微信中发给我的同学和一些友人欣赏，大家认为写得很好。我心里一直在等着他的诗集出版，但直至他去世，我仍未有见到，心里感到有些遗憾。那天和奉戡、志祥、永平同学说起这件事，奉戡说：“李老师的诗集早出版了，他应该给你呀，怎么没给？”晚上，奉戡把书名和序文发给我，果然是早出版了，可我确实是没见到。奉戡说给我向李老师的孩子们再要一本，我说不用要了，我就把先生的诗稿保存起来吧！数年之后，再看他的手书，看那我十分熟悉的字体，或许更有意义。

说诗到此，我还想说，我也有个心愿未了。这几年来，我也写了数百首诗。我早想拣其中我自认为可看者，呈请先生指点一下，也让他知道，这个老学生在学写诗。但我后来看他那么虚弱，视力又很不好，最终也没好意思给他增加负担。现在，这已成了永远不可能办到的事了！

青山老师走了！从此，我想再敬他一杯酒，再聆听他谈诗论词也永远不可能了，只能以这些文字抒发怀念之情。唯愿先生一路走好！

冬日乡村

闫关山

归村温语，日暮鹤声移。
旧巷连屋，斜阳照竹篱。

风吹线叶尽，柿挂故园痴。
客路多如意，乡愁落满枝。



银装素裹

张成林摄

安全行驶百万公里的标兵司机——薛环昆

李印德

1954年秋，薛环昆随青岛援同运输队来到煤炭重镇大同口泉，一直干到1985年退休。令人感慨和赞叹的是，他一辈子驾驶货运汽车，没有发生过一起行车事故。在大同整整30年的驾驶汽车生涯中，他累计安全行驶109.9万公里，相当于绕地球行驶了27圈半。

那时人们常戏言“车轱辘一转，给个县令也不换”，又说“喇叭一响，黄金万两”，可见货运司机这个职业在人们心中的分量。而薛环昆却说：“喇叭一响，想到人想到党。”这位山东汉子，敦厚朴实，少言寡语，他说出这样的话是发自他心底肺腑之言。

1925年，薛环昆出生在山东青岛胶县的一户普通农民家庭，十多岁就到青岛入了汽车行，开始学习汽车修理和驾驶技术。他从小经历了困苦生活的压迫，特别是在日军侵占青岛期间所受的欺凌与屈辱令他记忆深刻。青岛解放后，他成为新中国第一代汽车货运司机，终日奔波在青岛码头。他开始尝到了生活的甜头，感受到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自豪。到大同后，他经手过的汽车有七八个型号，载重量数吨、十数吨乃至数十吨的都有，价位低则数万元高则几十万元。他深知自己座下的每一辆汽车都是国家和人民的宝贵财产，是用来为国家创造更多财富的，他知道自己肩上的担子是何等之重。要想为国家创造更多的财富，就必须安全——多拉快跑，也就是说，汽车必须在最佳的状态下安全行驶。所以，薛环昆爱护和保养自己的汽车，就像是数九寒天，他照常会在凌晨五点前赶到车场，顶着凛冽的朔风，冒

着零下20多摄氏度的低温，从地沟里拉出热气管给汽车引擎底盘下的机油加热，使已经凝结的机油融化到正常状态，以进行循环工作。然后再冷摇慢转，使汽车的各个部件预热，绝对不允许先使用马达发动汽车。接着再给水箱加上常温水，才可发动汽车上路行驶。在炎热的盛夏，他就用自制的水箱，通过几根细水管，分别给每个车轮的刹车鼓和刹车片注水降温，以免刹车鼓和刹车片受热膨胀而降低刹车功能。

从口泉沟一直往里，穿过喧闹的集镇，驶过座座沸腾的矿山，行驶40余里到达黑流水、王村，而后爬上陡峭的大坡，便到了左云、右玉一带，这里有众多的地方煤矿和乡镇煤矿。这条百里煤海的汽车运煤线，“山高路窄车马多，一换挡位就爬坡”。薛环昆在长期的行车实践中，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安全行驶方法，概括起来叫作“一掌握二熟悉三中速”。

“一掌握”，是随时掌握车辆状况。薛环昆坚决执行出车前、行车中、收车后的“三控制”，绝对不让车辆“带病”行驶，始终保持车辆的良好状况。出车前，他先在车场缓慢行驶，细心捕捉倾听各部件的声响，看是否有异动，确定无异音和异响后，方可出场上路。在行车途中，每行驶到一定的里程后，必须停车例检，看看轮胎是否缺气，拖车钩

和缆绳是否牢靠。有一次，他在例检时，用脚踢了踢后轮胎，突然发现有两个螺丝帽松动了，就赶快用扳手加以紧固。“汽车轮上的螺帽松动，轻则甩轮，重则有翻车的危险。”这是他常常告诫助手和徒弟们的一句话。在中途停车例检时，他首先拉好手刹，再给车轮“打眼”，就是用石块等硬物卡在车轮下，避免溜车。每天收车后，他都要对车辆的各个部件全部检查一遍，看是否完好，然后加好机油，油箱补足汽油，把水箱的水放干净，才放心回家歇息。

“二熟悉”，是要熟悉路况，仔细观察路上车马行人动态。他把这些编成了顺口溜，比如“北风吹，冬天到，车馆穿棉戴皮帽，耳朵听不见，手脚不灵便”；“春风刮，沙尘多，行人穿行低头过”；“夏天多雷雨，路人撑伞赶道急”；“小孩结伴玩，到处乱蹦跳，青年人爱打闹，推推搡搡开玩笑”；“稍一不注意，事故就找你”，等等。

有一次，薛环昆驾车行驶到雁崖矿附近，突见前方右侧斜坡上一辆加重自行车飞奔而下，后座上捆绑着一个鼓鼓的大口袋。骑车人紧握双闸把手，嘴里“哇哇”乱叫，车速慢一点儿未减，直奔汽车冲来。薛环昆一瞅，便认定这位车主是双闸失灵，随即果断刹车，“嚓”的一声，汽车急停。自行车“咚”的一声，撞在汽车前轮的侧面。骑车人连滚带爬从地上爬起来，吓得脸如墙皮，也顾不上

撞弯的前轮和撒落一地的山药蛋，连连揖手向薛环昆道谢，“老师傅，你救了我一条命！”

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地来回往返奔波，薛环昆对口泉沟这条运煤线的路况摸得门儿清，早已烂熟于心：口泉老街上户商家聚集，人口稠密，横穿马路者多；永定庄矿路窄，矿工们出井后，大多扛个木疙瘩，身疲力尽，注意力差；同家梁矿商店饭店菜铺紧贴公路，路人多而繁杂；白洞矿、四老沟矿、挖金湾矿路窄坡多弯多……甚至哪一段路有几个坑，坑大坑小、坑深坑浅，他都一清二楚。

“三中速”，是坚持中速行驶。这是口泉沟运煤线路的独特性所决定的，绝对不能开快速车，而要严格做到“六慢五不开”，坚决做到“礼让三先”。

“六慢”即下山转弯慢，交叉路口慢，过桥会车慢，车多人多慢，天气条件不良慢，夜间行车慢。

“五不开”即不开狂飙车，不开斗气车，不开霸道车，不开英雄车，不开冒险车。特别是下大坡，一定要挂挡缓行，切不可空挡溜车。

“礼让三先”是遇到交通路口和道岔、人多车多的复杂路况，一定要先让先慢先停，不可抢道抢行，以避免事故的发生。尤其是通过无人看管的铁路道岔，一定要做到“一慢二看三通过”。

1985年，他光荣退休后，被公司返聘为车队安全员，继续为汽车安全运输工作而操劳着。

薛环昆来自风光旖旎的海滨城市青岛，他把自己的大好年华、一生的心血和汗水都挥洒在了大同百里煤海运煤线上，始终无怨无悔、默默奉献。

薛环昆奔忙在运煤线上，他的老伴在操持家务之外，也加入了家属装卸队，每天从运煤卡车上爬上翻下，顶风冒雪，一身煤末，满脸乌黑，挥锹大干。他们的六个孩子中，老大去了生产建设兵团，老二老三和女儿上山下乡插队落户，后来都陆续回到运输二公司入职。两个小儿子后来参加工作，也在运输二公司。六个孩子中有三个从事司机工作，两个干了修理工，女儿在公司后勤科室。孩子们退休后，有二男一女回到青岛安度晚年，其余都留在了大同，连同他们的子孙都扎根在大同，成了地地道道的大同人，都在不同的岗位上兢兢业业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添砖加瓦。

1997年，薛环昆师傅因病离世，享年72岁。让我们牢牢记住像薛环昆这些新中国建设的第一代拓荒者、奠基者、奉献者。

《大同工业史》编纂办公室供稿，欢迎社会各界来稿，来稿请发至平城书社邮箱：pcsy22@163.com

